

历代江西山志述要

伍 常 安

江西北临长江，南接闽越，东靠武夷，西占罗霄，境内层峦迭嶂，名山遍布，自古就是人文地胜之区，其中庐山、龙虎山、石钟山、青原山更是峻峭多姿，闻名遐迩，很早就有记山记地之作。据史书记载，自南北朝之后，江西山志便历代续撰不衰，仅庐山志就前后编纂十余次，版本达26种之多（不完全统计）。与我国传统的省志、府志、县志一样，江西山志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志、略、记、录等不同的书名，其中不乏名篇佳作，在我国山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一、《庐山纪略》奠定了山志编撰的基础

西晋之前，我国有关山的记述，仅见于《禹贡》、《山海经》等几部全国地理总志中，至于各地名山专书均无可考。江西境内山志专书，据史书记载，始于南朝晋释慧远的《庐山纪略》，距今约1600余年。该书隋唐史籍均未见著录，直至清乾隆年间纪昀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时，才收录于史部地理类，与历代山志专书合辑，称：“释慧远《庐山纪略》一卷，旧载此本（指宋陈舜俞的《庐山记》——作者注）之末，不知何人所附，今亦录之”。纪昀肯定了《庐山纪略》的志书性质。

《庐山纪略》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。魏晋六朝，是我

国历史上社会极其动乱的时代。不少文人退居山林，借吟诗作赋聊以自慰。同时，也有的出于爱国热忱，借写山水胜迹以表达自己对乡邦之情。“以是两晋时描述山水之作尤多。此后，山川寺观志之作，盖滥觞于此时焉。计当时记山之作见之于旧籍者，晋宋之际，有释慧远之《庐山记》（即《庐山纪略》）”。（王庸《中国地理学史》第三章）

大约东晋孝武帝太元六年（381），北方高僧慧远偕弟子避难南下罗浮（广东境内），路经庐山时，见此地山清水秀，林幽寺静，便于此驻脚，定居庐山脚下东林寺，在此生活了整整三十五年之久，死后葬于此地。在此期间，慧远广交名流学者，钻研佛义，建立莲社，创净土宗，宏扬佛法。由于他的倡导，庐山名刹一时叠兴，胜迹昭然，成为我国当时佛教名胜。

慧远三十五年间足迹不出庐山，广搜庐山轶闻旧事，考察人文地胜，遂将所见所闻编撰成《庐山纪略》。此书流传至今，仅能见到的文字约二千字左右。其特点有三：一是地域性，所记内容以庐山一地为界限；二是资料性，广搜资料记述庐山的历史和实情；三是综合性，所记内容较广泛，溶史、地、人物、艺文一体，辑合为篇，这些已初步具备了山志的体例要求，虽显简略，但层次分明，记述完整，其中内容已由过去地记的单一化记述转向综合性纂辑。这无疑为以后山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所以，方志界认为《庐山纪略》不仅是江西最早的山志，而且也是我国山志之始。

此后，山志编撰盛兴。据清代文廷式《补晋书艺文志》和章宗源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记载，这个时期还有王彪之、刘遗民、张野、宗测、周景式、袁宏、葛洪等人的记山之作，可惜多已亡佚，而其中对后世较有影响的周景式的《庐山记》也不复存在。周景式生平不详，据民国吴宗慈《庐山续志稿》，知其为南北朝时江西浔阳人。《庐山记》一书隋唐史书未见著录。明嘉靖桑乔

纂修《庐山纪事》时曾在序中称：“古之名贤，如周景式《庐山记》、张僧鉴《浔阳记》诸篇，今不及见，独见其数语于类书中”，仅见《水经注》、《艺文类聚》引录。清康熙年间，江西巡抚白潢在毛德琦纂修的《庐山志》序中，也说：“庐山旧志始自东晋慧远，又景式而下十余家皆失传。”

二、官修山志的出现使江西山志趋于定型

唐宋元时期，江西山志受历代图经、史志之濡染，开始趋向成熟。尤其是北宋之后，随着方志门类的增加，内容的扩补，其“资政、教化、存史”之功能日益突出，并逐渐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。某些地方官吏和文人于编纂省志、府志、州志、县志之余，常常又重视山志编纂。

这时的江西山志体例、内容，与早期相比有较大的变化。其中宋朝陈舜俞纂修的《庐山记》就是一部较有影响的山志。

陈舜俞字令举，湖州乌程（今浙江湖州市）人，官至都官员外郎。《宋史》本传称其：“博学强记”，苏东坡赞他“学术才能，兼百人之器”。宋熙宁中，陈舜俞出知山阴县，因不奉行青苗法，谪江西南康军监税。他游庐山两月有余，揽尽南北山水之胜后，“每恨慧远、周景式辈作山记疏略”。于是决心重修庐山志，“取《九江图经》前人杂录，稽之本史，或亲至其处考验铭志，参订耆老，作《庐山记》”。（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）宋秘阁校理李常在序中称他“昼行山间，援毫折简，旁抄四诘，大小不择。夜则发书考之，至可传而后已”。由此可见，陈舜俞是位注重实地考察的学者。

陈氏《庐山记》具有分门别类、图文并用，综合记述之特点。全书分八篇列目，“类而次之，以为记”。内容记庐山的“高下广狭，山石水泉，与夫浮屠老子之宫庙，逸人达士之居舍，废兴衰盛、碑刻诗什，莫不毕载。而又作俯仰之图，记寻山先后之

次，泓泉块石，无使遗者”^①。前三篇以方位设篇作类目，“总叙山篇第一”、“叙山北篇第二”、“叙山南篇第三”，有总有分，方位明确，条理清晰。后列十八贤传、古人留题、古碑目、古人题名等目。所以，《四库全书提要》中称“然宋地志，传世者稀，此书考据精核，尤非后来庐山纪胜诸书所及，虽经残阙，就可宝贵”。尤其是该记将图引进在山志中使用，是江西山志发展的一大进步，并为后人所沿用。然而，陈氏之《庐山记》毕竟还属早期山志之列，它同定型方志相比，记载内容有所欠缺。

元代元明善编纂的《龙虎山志》是已知江西第一部官修山志。元明善字复初，大名清河（今河北清河）人，是元朝一位很有造诣的学者，著作甚丰。《龙虎山志》“乃皇庆三年，明善官翰林学士时奉敕所修”。（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）龙虎山位于江西贵溪县境内，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圣地。自东汉张天师四代孙开山建场之后，历代王朝兴修观院，极受礼遇。元朝更重道教，据史书载，元仁宗曾为龙虎山上清宫题额赐匾，为彰其恩典之盛，特敕元明善撰修龙虎山志。可惜，该书清初时已佚，“原本体例不可复考”。明张国祥续修龙虎山志基本上是依元本而作，然而也不传，现在仅能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得张志之一二，其中篇目分类有山川、建置、人物、道侣和累朝制敕、艺文。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评，此书“颇为庞杂”。

江西山志自魏晋南北朝以来，基本上是以个人私纂为主，多数作者是不得意志的文人墨客，其中有遭谪受贬的朝廷命官，也有释道信徒。他们因命运多舛而寄情于山水之间。所作山志均是有感而作，带有某些随意性，再加上他们本人在政治上的失宠和社会地位的局限，都使他们的志书得不到社会的真正重视，于是山志的体例和名称始终没有确定下来。官修山志的出现有利于改变这种趋势，此后以“志”名书才开始趋向统一。

三、明清江西山志的体式风格变化

明清之际，是我国地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，“天下自国史外，郡邑莫不有志”，不仅数量之多，品类之众，地域之广，而且志体完备，内容丰富，可谓盛况空前。

江西山志这一时期出现过几部很有特色之作，如明万历左宗郢的《麻姑山丹霞洞天志》（17卷），明嘉靖桑乔的《庐山纪事》（12卷），清乾隆朱承煦的《怀玉山志》（8卷），清光绪胡传钊的《石钟山志》（16卷）。

明清江西山志有两个显著特点，其一，志体完备，体式多样。首先从形式上看，各山志内容明显地呈两部分，即：将山图、序言、凡例等列于卷首为第一部分。这无疑是一种体例进步，明代以前的江西山志不注意对序言、凡例的集录，山图、胜景图也不多见。集录山图、序言、凡例不仅能整体了解山志的内容，而且可以更深地了解山志的编纂过程和编纂方法，以及它与前人山志的继承演变关系，是很有价值的文字资料。第二部分是分类专述。它是山志的主体，分门别类记述山川、建置、风土、金石、人物、艺文等内容，也有带尾巴的，例如明左宗郢的《麻姑山丹霞洞天志》最后附录姑山志、姑山跋后。

其次在编纂方法上，江西山志于明嘉靖时首次出现纂辑体山志——桑乔的《庐山纪事》。桑乔，字子木，江都人。明嘉靖年间被弹劾，下狱，戍九江，“居庐北林隐庵，省愆之暇，漫辑录庐山古今事。既久，遂成篇帙，目之曰《庐山纪事》。”桑志主要特点是广收毕弋，类聚群分，集历代有关庐山的遗文旧志、游记图经、诗赋碑铭为十二卷，按山纪、品汇、隐逸、仙释、杂志、灾祥、怪异、艺文、山胜地理等目分文列句辑录。书中“纪事皆题原采书名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），标明出处，态度严谨。该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，如同一部庐山资料汇编，为后人

纂修山志提供了丰富的史料。

再次从篇目分类来看，江西山志在明代以前均采用诸目并列式编纂，即一事一目平列记述。由于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，致使志书类目越列越多，并列设目也不严密，人们多有非议。到明万历年间，左宗郢开始仿纪传体列目分类纂修《麻姑山丹霞洞天志》，即把“纪、传、考、志、表”等分别作为一个统类来设目，全书列七图、四考、二表、四志、五纪，构成一个体系，分类由原来的一个层次增加到两个层次。例如在“考”这个统类下，又分星野考、形胜考、古迹考、人物考四目。尽管统属关系不很严密，但作为一种新的体例形式出现却很有意义。

其二，记述内容各有侧重。江西山志自晋慧远《庐山纪略》以来，在内容记述上没有明显的变化，而到明清时期则有变化。如清乾隆年间朱承煦编纂的《怀玉山志》，在内容上是一部侧重于书院教育记述的山志。其类目就列有“兴学上谕”、“书院图”、“书院”、“院田师生”、“讲义”等多项有关书院教育方面的篇名。怀玉山位于江西东北部，算不上名山秀峰。然而山以人著，人以文名，早在北宋之际，文学家杨亿曾在此筑精舍读书。南宋时，朱熹与吕祖谦等名流学士也来此开馆讲学。此后，怀玉山书院之名始著，并成为历代名儒讲学求学之地。朱承煦纂此山志，时时不忘先哲们开山之功以及书院的兴废沧桑。所以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》称“此篇虽山志，而以书院为主体”。

清光绪胡传钊撰修的《石钟山志》更是独具见识，不以人文为主，而以兵备军事见重。历史上，石钟山因苏轼《石钟山记》而闻名于天下，更兼有酈道元、李渤等古贤之遗迹旧闻。胜境名文，相得益彰。明王恕《石钟山志》曾对此作过较为详细的记载。清胡传钊撰此山志时没有仍其旧例，而在内容记述上另辟蹊径。石钟山地处鄱阳湖和长江交接口，地势险要，交通便利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咽喉，“论形势，西扼楚蜀，东联吴会，北障

新蔡，南捍豫章，襟带江湖，锁钥城镇，伟矣哉！宜此地用武之多奇捷也哉”。②早在三国时，东吴孙策，屯兵于此，大破庐江太守刘勋。后，周瑜在鄱阳湖操练水师，由此出兵赤壁，一举击破曹营。明太祖朱元璋也曾据此大战陈友谅，王守仁曾领兵与明宁王朱宸濠叛军在此大动干戈；清朝末年，太平天国军扼守山险，与曾国藩水师苦战多时。胡传钊深谙兵备武事之重要，所编撰的《石钟山志》资料多由清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、湖口镇总兵丁义方搜辑提供的，“故其于武功为最显，然于山志，实为创体”。

四、承前启后的民国江西山志

这一时期的山志，大致可分为两类：一类为明清旧志的续编，如彭大融、罗镜仁续编的《续修青原山志》等。另一类山志，是运用新科学技术和知识编纂的现代山志。其中影响较大，流传甚广的是吴宗慈1933年编纂的《庐山志》和1947年编纂的《庐山续志稿》两部山志。

吴宗慈，字霭林，江西南丰人，现代历史学家和方志学家。他一生著述甚丰，曾前后纂修过三部志书，1940年受江西省政府之聘重修《江西通志》，所纂两部庐山志先后仅相距十五年，正志、续志出自一人之手，为我国方志史所罕见。

吴宗慈的庐山志不论是私撰（前志），还是官修（后志），都持严谨态度。其内容详实，考核精当，体例完备，具有很高的实用性和科学性。近代著名学者陈三立在序中称道：庐山志“既佐以图表，复参以后起专门之新技术，务在纠阙误，辟矫枉，归于详实，而资利用，此古今山志所未有也，独是霭林凭一己之发愤，就瑰异之盛业，其精勤诚过人远矣”。首先，在体例上摆脱了旧志成例的束缚。如用纲目体分类列目。这种体例比较适应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和多层次的联系，又利于体现志书的功用。例如

第一纲“地域”下分设：庐山总图、经纬度和释名、地质志略、山脉水系、形胜、沿革、疆界、道路、面积、气象等目。这些丰富的内容，几乎包揽了庐山地质地貌的基本地理情况。在内容和篇目的设置安排上，吴宗慈善于因事定制，从庐山的实际情况出发，重点突出了“山政”“物产”二纲。其中“山政”一纲，“为古今山志之创”，所记内容有：租借地涉外议案，中外名人在庐山的记实，中央行政、省级行政驻山机构的建置，地方自治和政治设计以及其公共事业和军事设施等。其中包括1937年7月召开的“庐山谈话会”、“庐山军官训练团”、“三青团训练班”，以及司徒雷登、马歇尔上山记实。这些史实是研究我国近、现代史的重要参考资料。吴宗慈善于谋篇布局，将政治军事方面的内容集“山政”一纲，从而较好地体现了庐山的特定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。吴氏山志在体例上的另一个创新是设“大事记”一目，“专记庐山抗战之经过史实”。

其次，吴宗慈撰修山志讲求科学性。他著书严谨，为核实史料，每日涉山数十里，“山南山北各地均亲身履勘”，“杂采诸书凡数百种”。对那些专业性很强的学科，他极为谨慎，特意聘请各类专家学者撰述有关章节。如聘请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撰写《庐山地层表》，聘请生物学家胡先骕进行庐山生物调查，聘请专业人员运用等高线、经纬度等确定庐山地理位置，绘制地图。这些新科学新技术新知识在山志中广泛运用，保证了志书的质量。

吴宗慈特别注重志书的实用价值，他认为“修志以实用为归”（《修志丛论》），如“不适用，则可谓为朽骨”（《论今日之方志学》）。在庐山志的“物产”一纲中，吴采用近代生物分类法对庐山的动、植物进行分类，并对各种动、植物的形态、习性作了简要说明，他在植物名录中说“将本山所有之森林植物，悉依学名之英文字母顺序排列，所以便利世界植物学家调查

与参考之用”。所以他的庐山志刚一出版，此书四分之三就被外国人买走了。

但是，吴志记述经济方面的内容不多，忽略了历史大事记。另一方面又过多地记述了国民党政府的庐山会议和大量的文件、决议等，存在着很大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。这又是不能不正视的问题。

注：

① 吴宗慈《宋陈舜俞庐山记合校本》李常序。

② 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》史部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江西省省志编辑室

李玉照的生卒年

明代戏曲作家沈自征（号渔阳先生）的继室李玉照，工诗词，其作品见于朱彝尊《明词综》、沈祖禹和沈彤合编的《吴江沈氏诗集录》等书中。只是由于作品传世不多，故不大为人注意。沈自征故世后，李玉照年轻守寡，抚育幼子，后来其子沈永群、孙沈俞嘏都成了称誉吴中的诗文家，这里面自然少不了李玉照的文学熏陶。为研究吴江沈氏文学世家所必需，兹将其生卒年考之于下。

《吴江沈氏诗集录》载：“李硕人，字玉照，浙江会稽人，渔阳公继室。年二十五，公卒，抚孤守节三十八年。”考《启祯野乘》，沈自征卒于明崇祯十四年（1641），联系《吴江沈氏诗集录》所载，知李玉照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），卒于清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。

此亦可补张慧剑先生《明清江苏文人年表》之缺。

• 郑平昆 •